
复交 40 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冯昭奎

内容提要：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的本质，是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入 21 世纪，日美关系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美国“重返亚洲”，阻碍了本来是亚洲国家的日本“重返亚洲”。钓鱼岛问题是 1971 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在中日之间埋下的“地雷”。复交 40 年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中日两国需要以和平方式“共同排雷”。“双管齐下”模式是推动中日解决矛盾、进一步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有效做法。

关键词：中日关系 美国因素 钓鱼岛问题 重返亚洲 日美关系周期论

作者简介：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2) 05-0049-16

中日复交已有 40 年了。回顾 40 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令人感到中日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第三国因素”，这就是“美国因素”。这个第三国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对华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对华关系”，是“在对美不平等条件下的对华关系”，是“在日美中三角形框架中发展的对华关系”。^①日本对华关系的这种“定位”，必然使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当然，从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因素来看，“美国因素”充其量不过是外因，日本基于自身国家利益所制定的对外战略才是内因，日本往往为了推行其对外战略而对“美国因素”主动地加以利用甚至“放大”，从而呈现为“内因主导外因”和“外因主导内因”交错出现的局面。与此同时，也需看到日美关系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很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属于“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或“日本一面承认从属于美国的现实，一

① 細谷千博『日本外交の軌跡』、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3 年、220 頁。

面争取对美平等地位”^①的矛盾，其实，“领导和被领导之间”长期的积怨与矛盾也是很深的。

一 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刘世龙通过对迄今 200 余年日美关系历史的深入研究，认为日美关系以 1911 年为界，经历了摇摆于平等（竞争）与不平等（合作）之间的两个周期。从 1952 年到 1989 年，日美关系处于“不平等时期”，两国关系的基调是“日本对美从属性合作”。^② 本文讨论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美国因素，其本质正是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从战后到 1972 年，中日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尽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运动日益高涨，但两国政府之间不仅没有交往，而且在岸信介、佐藤荣作这两届内阁期间陷入了对立的关系，其原因除去岸、佐藤本人的反华性格之外，也取决于当时美国敌视中国，严格控制日本政府不得发展对华关系，而日本政府即便面对广大国民强烈要求发展日中关系的呼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得在官方对华关系上步步追随美国疏远甚至敌视中国。1971 年 6 月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美国将钓鱼岛也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尽管美国没有“深谋远虑”到钓鱼岛问题对于离间中日关系能够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但客观上就是将钓鱼岛纷争的“地雷”埋在了中日之间。

1971 年，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全球战略考虑，通过基辛格秘密访华，走出了改善美中关系的第一步。1972 年尼克松总统在不同日本商量甚至不事先告知日本的情况下突然访华，令日本产生羞辱感：美国一方面不允许日本发展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却由总统越过日本亲自飞到中国，与中国发展关系，作为日本的同盟国美国此举也太不仗义了。为了回击美国的“越顶外交”，在 1972 年当选为首相的田中角荣冒着被极端反华的日本右翼分子暗算的风险，顺应日本广大国民要求恢复与中国邦交的强烈呼声，抢先美国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美国直到

①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17 页。

② 参见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第 3 页。

1979 年才与中国建交。虽然田中首相同中国复交与美国欲改善对华关系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也可说是与美国全球战略“不谋而合”，但他“不听话”，未经美国“批准”抢先改善对华关系所体现的“自主外交”仍然令美国感到不快。加之 1973 年石油危机发生以后，田中角荣对美国更加“不听话”，积极开展自主的“资源外交”（历访主要石油产出国，甚至包括会见苏联领导人），更是让美国恼怒。^① 其后不久，田中首相就因为“洛克希德事件”而下台，其实是被美国整下台的。^②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日关系发展得最好的时期，两国人民之间十分友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似乎美国也未对中日走得如此亲近有所不快。这是因为：（1）当时中日美“一条线”对付苏联“威胁”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发展符合美国全球战略利益；（2）中国改革开放主要就是向美欧日“西方”开放，日本通过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以及开展日中经济知识交流等促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3）当时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已成为美国最大经济竞争对手的日本，在 80 年代末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日本威胁论”盛行一时。

根据上述日美关系周期论，从 1989 年以后至今是日美“准平等时期”，两国关系的基调是“合作与摩擦并存”。^③ 但从事实看，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日美失去了对付“共同威胁”苏联的战略需要，这对日美关系进入“准平等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90 年代前半期日美发生的严重经济冲突，正是日美关系平等化的结果。然而，进入 1995 年以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在缓和与日本的经济摩擦、发展经济合作的同时，努力为美日同盟寻找一个可能取代苏联的新的共同威胁，以作为维系美日同盟的新纽带。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力不断增强，美国渐渐意识到一个新的潜在竞争对手正在崛起，而日本

① 田原総一郎『アメリカの虎の尾を踏んだ田中角栄』、中央公論、1976 年 7 月。

② 据记载，1976 年 2 月 6 日，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副董事长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证实该公司“通过丸红商社将 200 万美元交给了日本政府高官”。此后，三木武夫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福特，要求美方公布全部有关资料。这成为包括田中角荣在内的数名高官最终被判刑下狱及罚金、创下战后日本之最多的错综复杂的反腐败案件的开端。参见：石川真澄『戦後政治史』、岩波書店、1995 年、136 頁。

③ 参见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第 3 页。

经济则陷入了长期低迷，日益不被美国看做是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进入 21 世纪，正当美国开始“关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候，却被“9·11”恐怖袭击事件转移了注意力，接着陷入了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潭。与之相反，在 2001 年实现“入世”的中国却赢得了预计长达 20 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前十年顺利发展。这十年期间，中美两国的国力此消彼长，使 2010 年终于从“反恐挂帅”和战争泥潭中得以脱身的美国更加感到需要防范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对其霸权地位的“威胁”。

“美国是个旧式霸权国，不愿放弃对日主导地位。日本要取得对美平等地位，就得与美国斗争。这将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拥有主导权的美国为避免与日本对立，将推动日本把矛头指向其亚洲邻国，通过成为与美国无异的推行强权政治的旧式国家，实现与美国的平等化。”“日本如果与美国一起推行霸权主义，就有可能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主义的马前卒。”^① 这样，在 1989 年日美关系进入“准平等时期”后，两国关系不仅距“平等”依然甚远，而且反而使不平等有所加剧。这是因为日美关系周期论研究的是日美双边关系的演变规律，然而从 90 年代后半期以后，日美关系中有一个强大的“第三者”日益凸现，这就是“中国因素”或所谓“中国威胁”。正如日本学者所称：（1）日本在表面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门面，实质上仍然被美国占领着，是美国的战略根据地；（2）日本牺牲“民族自尊心”、忍受“被外国占领”的最大理由是为了对付“中国威胁”；（3）军事同盟不是“慈善事业”，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与美国在军事上对等的同盟国；（4）由于美军的驻留，日本的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可以保持在 1% 以下，从国家防卫的成本来说，这是很有效率的做法。^② 这意味着被虚构为一种新的“威胁”的中国因素，导致进入“准平等时期”的日美关系依然很不平等。

21 世纪头十年，日美关系的实际发展基本符合上述规律：除鸠山由纪夫执政期间（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以外，日本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没有偏离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尤其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的约五

①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第 5 页。

② 增田俊男『日本大復活』、PHP 研究所、2006 年、80 頁。小川和久『日本の戦争力』、アスコム、2005 年、108 頁。

年半期间（2001 年 4 月至 2006 年 9 月），日本对美关系达到了战后最佳状态，而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不友好。

二 美国“重返亚洲”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0 年，美国高调宣称要“重返亚洲”，然而“脱亚”近一个半世纪、原本就身处亚洲的日本却未见其“重返”迹象。虽然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高调主张要实现“东亚共同体”大目标，显示出“重返亚洲”的真诚意愿，但他只做了八个半月首相，就因为处理不好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而辞职，实际上是被要“重返亚洲”的美国操弄日本“民意”赶下台的。此后上台的民主党“反小泽”派的菅直人、野田佳彦两届内阁，不但很少提“东亚共同体”，反而决定加入美国主导、与“东亚共同体”分道扬镳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显示出要在“脱亚”一条路上走到黑的决心。

美国“重返亚洲”或“战略东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利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吸取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活力，防范以中国为“领头羊”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导致美国霸权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削弱。但是，美国却不愿意让盟国日本同其一道“重返亚洲”，而且显示出美国越要“重返亚洲”，日本就越不能“重返亚洲”的意愿，或者要日本只能遵循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需要，在亚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支持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亚洲小国菲律宾、越南向中国叫板：表示要加入 TPP；提出所谓“太平洋宪章”构想等等，显然，这是日本故意利用“美国因素”增强其在亚洲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推行“联菲、越等部分亚洲国家以达到制华目的”的战略，与日本的亚洲派政治家所主张的从“脱亚”到“返亚”、以亚洲国家团结为宗旨“重返亚洲”的初衷完全是南辕北辙。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日本在经济领域越来越融入亚洲，特别是 2007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对象国。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的灾后复兴也亟须加强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合作，日本“重返亚洲”应该是其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亚洲人结束几百年来“先进欧洲、落后亚洲”噩梦、推动亚洲和平发展、实现

“振兴亚洲”大目标的要求。

那么，日本能“重返亚洲”吗？这个事情就目前来看可以说很难，因为日本“重返亚洲”与美国“重返亚洲”的需要是相矛盾的，美国不愿意看到日本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走近。因为在美国看来，中日如果团结起来，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感”和利益就会受到排挤和削弱。如前所述，早在 1971 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就在中国间埋下了“地雷”——钓鱼岛问题，致使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摩擦不断，无法走近，这恰恰是“符合美国想法的中日关系”。

既然美国不想让日本“重返亚洲”，日本就不能“重返”，因为日本至今仍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国家，“依然是一个被美国占领的国家”。2010 年小泽一郎被指控《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以来，明眼人开始识穿在千方百计要打压小泽的势力背后，存在着一只美国操控手——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其后 CIA 的名字在日本媒体上频频曝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从日本的媒体到政界，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足以使美国让日本首相服服帖帖顺从美国指挥棒，美国要日本向西日本就不敢向东，哪位首相对美国“不够听话”，就会重蹈田中角荣、鸠山由纪夫的覆辙。显然，只要日本在日美同盟中仍处于被控制的从属地位，哪怕是像前首相鸠山那样仅仅是想让日美关系变得“平等”一些，让过于侧重美国的日本对外关系变得“平衡”一些，主张“日美关系很重要，日中关系也很重要”，就会因为冒犯了美国盟主而被迫下台。美国特别是 CIA 对日本的影响力之大，使长期同美国打交道的日本政治家和官僚即使对美国的专横跋扈有所不满也只好忍气吞声。

但是，围绕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日美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矛盾：首先就是前文所述“日本一面承认从属于美国的现实，一面争取对美平等地位”的矛盾；其次是美国借“返亚”加强对日本等盟国的控制与日本“一面接受被美国控制的现实，一面争取缓和美国对其控制”的矛盾；其三是日本看到中美战略对话无论在内容的充实上还是在对话的深度上都明显超过中日战略对话，因而不能不担心美国再次搞“越顶外交”而被“边缘化”，而美国则不肯明确表示为钓鱼岛问题而与中国兵戎相见、彻底摊牌的意愿。这实质上是格伦·H. 斯奈德所称的同盟国相互之间存在着“被抛弃”和“受牵连”的矛盾，即结盟的国家

经常担心盟友的背叛，包括没有依据盟约向己方提供应有的支持、解除盟约甚至与敌国结盟等（“抛弃”），而结盟的另一方又害怕因盟友的利益而被拖入一场与自身利益相悖的冲突（“牵连”）。“为避免‘被抛弃’，就必须以行动取得盟友的信任，而这样做势必增加‘受牵连’的危险。为避免‘受牵连’，就必须与盟友保持距离，甚至在盟友与敌国发生冲突时不过深介入，但这样做又可能冒‘被抛弃’的风险。如果一国为增强自身安全感而强化同盟，那就可能引起敌国敌意的上升。可如果一国为避免引起敌国加深对它的敌意而选择弱化同盟，又可能事与愿违地纵容敌国的扩张意图。”^①

尽管日美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从日本目前受美国控制的处境来看，要日本“重返亚洲”确实很难，但从中长期看也并非完全没有希望。这是因为随着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各国的经济与文化的凝聚力日益增强，随着“中国威胁论”遭遇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推进现代化的铁的事实而不攻自破，随着日本国民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反应”逐渐缓解，随着日本“亚洲派”及植根于民众深处的和平、民主力量的顽强奋斗，随着中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地区性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日益上升，在历史上曾被鉴真和尚称为“有缘之国”（与佛法有缘，与中国有缘）的日本终将认识到“远亲不如近邻”，诚心诚意地踏上“重返亚洲”之路。

三 复交 40 年的教训：中日应“共同排雷”

如前所述，钓鱼岛问题这个中日之间的“地雷”是美国埋下的。诚如程亚文所指出“1972 年美国将冲绳交还日本时，不顾中国反对，顺手将钓鱼岛一同打包，为今日中日交恶早早埋下伏笔，实际上应该认为这是美国基于自身战略传统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一种特意安排，使东亚地区两个最可能对美国形成战略挑战的国家，为钓鱼岛问题陷入彼此间争斗，美国则可从中坐收渔利。日本大闹东海与中国过不去，背后也有美国的旨意在起作用。在亚太区域，中国不仅与日本，实际上与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更多的摩擦。钓鱼岛问题同样是这种国际博弈的有机

^① 梁志 《“同盟困境”理论的“困境”》，<http://www.cssn.cn/news/518911.htm>。

构成，它不简单地只是中日关系。”^① 今年是中日复交 40 周年，两国已经开展了多次纪念 40 周年的活动，然而两国关系的气氛却因为钓鱼岛问题升温而十分紧张。最近，继 4 月石原提出“购岛”，7 月野田示意国有化，8 月抓扣香港保钓人士，国会议员和右翼团体成员“慰灵”和登岛。日方这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倒行逆施，令众多相信中日两国关系发展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并因而期待中日两国关系趋于改善和向前发展的中日两国人士感到非常失望和十分焦急。

（一）日本为何在钓鱼岛问题上气急败坏折腾不休

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频频挑衅，故意激怒中国。从日本国家战略层面来说，其目的就是为政者借钓鱼岛摩擦凸显“中国威胁论”，进一步向国内舆论证明其亲美外交路线的正当性。与此同时，日本越来越“成为与美国无异的推行强权政治的旧式国家”也完全符合上述日美关系“平等—不平等—平等”的演变规律。

其一，从日本国内政治层面看，一些政客企图以对华强硬来赢得国内选票，特别是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异军突起，大胆涉猎外交与国政，各色人等都想抓住“乱世出英雄”机遇，展示一下独特的“英雄”风采。在美国“返亚”和 2010 年撞船事件激发日本国民厌华感情进一步上升的背景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战略上都被认为是日本所谓“重要国家利益”的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成为一些投机取巧的政治家们的“政治肥肉”，借此大搞“捍卫国家利益”的爱国秀，其中年届八十、“思想很旧”的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 2012 年 4 月在美国华盛顿突然提出要“购买”钓鱼岛，采取极为恶毒、极具煽动性的卑劣手法破坏中日关系，其国内政治算盘就是打着“捍卫国家利益”的旗号，纠集地方和中央的右翼势力，煽动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狂潮，叫板所谓“对华软弱”的民主党政权，最终达到推翻民主党政权的目的。

对此，日本政府虽然对石原处心积虑的图谋“心知肚明”，但架不住其通过号召“捐款”突破了购岛资金的瓶颈，而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租约将在 2013 年 3 月底到期，于是野田首相在 2012 年 7 月上旬提出“中央政府有意购买（钓鱼岛）”，并表示要同“岛主”

^① 程亚文《钓鱼岛回归路漫漫》，《南方周末》2005 年 2 月 24 日。

(埼玉县的土地资产所有者栗原国起) 沟通, 然而“岛主”表示不愿卖给中央政府, 这使石原像打了强心针似地叫嚣要野田政府“闭嘴”。对石原和野田“抢买”钓鱼岛的出格行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任何人拿来买卖。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① 日本政府有关人士则诡称: “如果石原执意购买钓鱼岛, 将进一步挑动中国敏感的神经, 日中关系的恶化将无法避免, 事态可能变得不可收拾。如果日本政府购岛, 我们就能更好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有中国学者评论说, 不排除日本与石原们上演“双簧戏”以强化日本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主张的可能性。

其二, 从国际关系层面看, 美国高调宣称要“重返亚洲”, 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对日本等亚洲盟国的控制, 打着对付“中国威胁”的旗号, 使日本等亚洲国家甘心于对美不平等地位。另一方面, 日本以及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一些南海“声索国”则将美国东进视为“战略机遇”, 在海岛主权、海域划界问题上纷纷向中国发难: 2012 年 4 月 10 日起, 中国的两艘海监巡逻船为保护在我黄岩岛海域作业的渔民而与菲律宾军舰对峙; 2011 年 11 月和 2012 年 4 月, 越南不顾中国反对先后与印度、俄罗斯商议联手开发南海油田, 等等。在这种形势下, 不肯自甘寂寞的日本与南海“声索国”相互串联和支持, 在 2012 年 5 月下旬三艘日本军舰对正与中国吵得火热的菲律宾进行“亲善访问”, 日本还计划要向菲律宾提供十艘巡逻艇和两艘舰船, 加强菲律宾海巡能力。石原慎太郎则乘中、菲在黄岩岛对峙之机, 选择华盛顿作舞台, 扬言要由东京都“购买”钓鱼岛并称“中国反对日本‘购’钓鱼岛无异宣战”, 这一表演所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十分耐人寻味, 显示出日本借力美国东进之“机遇”, 与南海“声索国”一起跟中国闹的险恶用心。

其三, 从民众情绪层面看, 对于中国崛起, 日本有一种既感到失落又觉得不服气的纠结心理。尽管其他亚洲国家也有这种纠结心理, 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心理更重。因为日本在 20 世纪成为亚洲“一枝独秀”的工业化国家, 特别是在战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所谓“经济奇迹”,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然而 2010 年日本经济总量“世界老二”

^① 《人民日报》2012 年 7 月 8 日。

地位却被中国取代，而这个“被取代”问题对其他亚洲国家并不存在，这导致日本人对中国崛起尤其是对自己“被超过”而格外感到懊恼和沮丧，加上日本媒体对中国发展中的负面问题报道很多，使日本人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感到惊羨，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凸显的问题之多感到不服气甚至反而增强了“优越感”，看中国什么都不顺眼。此外，在中日围绕历史问题（比如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生摩擦的时期，日本曾出现过的所谓“国论两分”（一半以上的国民不支持首相参拜）的情况，然而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最容易获得民族认同感，长期被灌输“尖阁诸岛（我钓鱼岛）属于日本”的日本人可以说从上到下立场几乎一致，于是为了“捍卫主权利益”，无论政府对华怎么强硬，民众一般都会支持。

然而，日本以为有美国做靠山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正如日本评论家指出“军事同盟不是慈善事业”，尽管美国确实对中国崛起有防范心理，但美国内心很清楚，其“重返亚太”是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替亚洲大小同盟或非同盟伙伴一个一个地“打抱不平”；美国打的是全球战略大算盘，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伙伴国的利害关系铤而走险、拔刀相助，实实在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日本如果以“事情闹大了等着美军来救援”作前提，怎么痛快就怎么玩地搞“买岛”甚至“驻军”之类的游戏，不得不说这是十分危险的。

总之，目前日本有些政客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面对所谓“中国威胁”舞枪弄棒，而美国在其背后却不动声色地加强了对这个企图争取平等地位的从属同盟国的实际控制和利用，加剧了美日之间的不平等。这恰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生动写照。

（二）日本国内的理性声音在上升^①

日本的政客妄图以对华强硬来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示强虽然能一时获得部分民众的喝彩，但日本民众更关心的是国内问题，诸如提高消费税率、重启核电站等事关民生的大事，如果野田政权把日中关系搞得一团糟，影响到对日

^① 由于篇幅有限，诸如谷口诚、高原明生、丰下楷彦、猪间明俊、凌星光等人的言论不再一一列举。

本灾后重建和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对华经贸关系，也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尽管现在舆论调查显示有 80% 以上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但同样有 80% 以上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很重要，如果日本政府对华强硬得太过分，引起两国关系发生全面危机，同样是日本国民不愿意看到的。此外，还需注意到日本国内头脑清醒者大有人在，日本政府不能不倾听国内有识之士频频发出的理性主张和呼声，以下择其要者加以列举。

其一，“发展日中关系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认为“对待领土问题应该超越国内的视野，要考虑如何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大目标而努力。”“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可预测的合作关系，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日中之间的问题有七成是基于误解和理解不足。”^①

其二，“这个世界没有给任何民族留下只顾自己、恣意妄为耍性子的空间，有时一个民族必须接受令其感到难以接受的现实”。日本前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享最近发表题为《搁置的现状对日本有利》的文章指出“中国方面已从历史角度，阐释了……尖阁诸岛（我钓鱼岛）属于台湾地区，尽管对此有不同解释，但绝不能说中国方面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这对日本人来说也许难以接受，但却必须认识到尖阁诸岛并非日本的‘固有领土’，而是一块‘争议之地’。遗憾的是，无论日本的政治家还是国民都坚信，只有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才是正确的选择。然而，一味取悦舆论的外交，必将最终有损国家利益。日本强硬，中国也不得不强硬……那种认为因为有《日美安全条约》，美国会保护日本的想法，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日本的政治家和国民都应理性地认识‘搁置’争议的好处，这绝不是示弱。”^②

其三，“国家利益界定的失误，必定导致国家衰退”。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指出“一个国家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当今世界的现实“正在考验着日本的外交的真正价值取向，也考验着日本外交的‘根本’，即国家利益如何界定”，“如果不能正确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国家注定会衰败。战前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① <http://www.toyokeizai.net/life/review/detail/AC/6c5857eb0ce691bbb16be8353e5384d8/page/3/>.

② <http://www.asahi.com/news/intro/TKY201207100572.html>.

“不应当盲目主张追求僵化的本国利益，而应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确保本国的利益”，“从主张对外强硬的国家利益论争中，我们不难发现……过多的防卫意识和短暂而情绪化的反应，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今天的国家利益论争是多么危险”。小原主张日本应从“战前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即“封闭的国家利益”，转向“国际协调主义”即“开放的国家利益”，“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对外强硬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给国民带来一种愉悦。经济或社会越是停滞不前，政治或媒体就越是把国民不满的发泄口转向国外。可是，这样浅薄而情绪化的舆论会阻碍长远的国家利益”。小原总结了今天日本的六大核心国家利益，其中第一是“东亚的稳定”，第二是“防止日本周边出现敌对国家”。^①

其四，“领土问题特别容易被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手段，必须冷静地客观地加以应对，必须保持倾听对方的不同见解的意见和立场、以科学的综合的观点、致力于和平解决问题的精神”。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列举了“钓鱼岛是 1895 年 4 月马关条约缔结之前日方偷偷地编入冲绳县八重山郡的，因此在马关条约缔结时并没有提及（钓鱼岛）”等事实，认为“为了和平地解决钓鱼岛问题，首先必须做到‘事实的共有化’，将共有化的资料互相翻译成对方国家的语言，广泛地向全世界传播。从‘事实的共有化’进一步向‘认识的共有化’前进，通过双方的科学的客观的知识的积累，定将产生出和平地友好地解决问题的智慧，开拓日中关系的光明未来。”^②

可以认为，在今天的日本，明白人大有人在，而当今日本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让明白人当家”，如果日本做不到“让明白人当家”，甚至把家交给擅长作秀的疯子和赌徒一般的政客去当，那么日本的前途将可能是十分暗淡甚至危险的。

（三）中国如何与日本“共同排雷”

对于中国来说，人们看到日本一些政客在钓鱼岛问题上小动作不断，右翼人物及少数政客借钓鱼岛问题掀起了一股接一股的反华浊浪，

^① 参见小原博雅《日本走向何方》，加藤嘉一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23、34、35、38、93~98页。作者指出的其余四个核心国家利益是反恐、加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海上航线的安全。

^② 日中经济交流史研究会「配布資料」、2012年6月14日。

可以说,2012 年中日围绕钓鱼岛的摩擦是继 2002 ~ 2006 年中日围绕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生的摩擦(“靖国逆流”)之后,中日关系出现的又一次大的“逆流”。表 1 示出了这两次逆流的比较。

表 1 “钓鱼逆流”与“靖国逆流”的比较

	“钓鱼逆流”	“靖国逆流”
主要人物	东京都知事、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	首相小泉纯一郎
问题性质	起源于历史问题的现实利益问题(包括渔业、海底油气等资源、军事战略利益)	历史认识问题
舆论反应	大多数国民支持政府强硬立场	“国论两分”,50% 以上国民不赞成参拜
理性主张代表人物	孙崎享(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村田忠禧(著有《怎样看待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	加藤纮一、高桥哲哉(著有《靖国问题》)
日本国内政局	政局动荡,2012 年 7 月野田内阁支持率跌至 21.3%	小泉维持长期政权,2001 年 4 月至 2006 年 9 月任日本第 87 ~ 89 届首相
中日关系状态	中国坚决反对日本的买岛、钓鱼、视察等“系列闹剧”,但没有打经济牌	领导人中断互访,“政冷经热”
美国态度	希拉里国务卿表示钓鱼岛“适用”安保条约第五条,但日本仍担心美国“口惠实不至”,担心美国不会为日中钓鱼岛争端直接与中国兵戎相见	美众议院亨利·海德强烈批评小泉参拜,《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批评参拜
周边国家反应	菲律宾、越南等南海问题“声索国”在与中国的岛屿争端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与日本相互呼应、支持;另一方面,俄罗斯和韩国在同日本的岛屿争端问题上均采取了比过去更强硬态度	韩国政府和民间强烈反对小泉参拜

通过对“钓鱼逆流”与“靖国逆流”的比较,可以看出“钓鱼逆流”对中日关系的损害要更加严重,中国的外交回旋余地收窄,面对问题更加棘手。从表 1 也可以看出,当前的逆流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所掀起、进而裹挟日本媒体和政府、煽动日本国民和舆情、讨好欲

“重返亚洲”围堵中国的美国、企图通过激怒中国而将双方都无意进入直接对抗状态的中美两国拉入直接对抗甚至冲突、以达到其邪恶的政治目的的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狂潮，从日本政府看，围绕钓鱼岛问题搞“岛屿命名”并向西南方向调兵遣将，特别是野田声称将会出动自卫队应对钓鱼岛争端，则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焦躁心理，这就是担心中国日益强大、中日国力差距日益拉大以后，终将使日本无力与中国争夺钓鱼岛。

然而，一个显然无误的事实是：钓鱼岛问题不必操之过急，时间在中国一边，随着中日力量对比继续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化，讲究实力哲学的日本也会倾向妥协的选项。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想同美国对抗，中国不会因为钓鱼岛问题而破坏稳定的周边环境，导致缩短“战略机遇期”。为此，我们对待钓鱼岛问题宜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

其一是发展对日关系与发展对美关系“双管齐下”，促使中日美三角形从目前过度不平衡的三角形（“日美边”太短也就是太近，“中美边”和“中日边”太长也就是太远）朝向比较平衡的方向发展（尽管中国不可能改变“日美边”的长度，却有可能改变“中美边”和“中日边”的长度），既防止日本利用中美对抗获取渔翁之利，也防止美国利用中日对抗获取渔翁之利。如前所述，钓鱼岛问题“不简单地只是中日关系”，至少它是涉及中、日、美三国的问題，美国所涉主要有：（1）1972 年美国归还冲绳时擅自把钓鱼岛行政管辖权划归日本；（2）战后美军长期把钓鱼岛附属岛屿黄尾屿、赤尾屿作为美军靶场；（3）2012 年 7 月 9 日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但那个第五条是指“在日本国施政下的领土”，而 1972 年被划归日本的只是钓鱼岛施政权，美国并未承认钓鱼岛是日本拥有主权的“领土”，怎能说钓鱼岛是那个第五条的适用对象呢？^①

既然钓鱼岛问题涉及美国，那么，中日美国围绕钓鱼岛问题展开三边对话大有必要，可以考虑利用美国的影响，使其向日本明确表达不愿中日开战的意愿。因为石原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其“底气”就是认为如果中日因钓鱼岛开战，美国会帮助日本，所以此事症结还在美国。但美国并不愿中日开战把自己拖下水，因此美国表态对美国自身也是有利的。

^① 参见刘江永《该给日美补补历史法理课》，《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 7 月 16 日。

其二是加强中日之间的危机管理机制与争取日本民间舆论“双管齐下”，加强危机管理机制是为了谋求双方对什么是“危机”（比如说可能发生对某种事态一方认为是“危机”而另一方却不认为是“危机”的情况）和如何管控“危机”等问题达成共识，近期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虽然下降，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野田政府并不想负上使中日关系全面恶化的责任，中方可以与日本政府协商找出既能有效应对石原购岛、又不致过于伤及中日关系的办法。而在争取日本民间舆论方面，一个具体建议就是围绕钓鱼岛问题开展中日共同研究，或者至少双方都将有关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议公之于众，比如中方学者刘江永在 2011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整版文章《从历史事实看钓鱼岛主权归属》，不仅说明了中方认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观点，也介绍了日方的不同意见，那么，日方也应该这样做，两国学者也可围绕这个问题在两国媒体上充分开展研究和争论。与此同时，正如叶小文所指出“中日之间现在难办的是，两国都可能出些极端分子，固执己见，挑起事端，制造麻烦。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特别是失业率趋高，国民心态最脆弱的时候，民族主义最容易被极端主义操控为一种不理性的、短视的群众热潮。中日关系当下的主要危险，在于‘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的挑衅和煽动。我们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① 我们不要使中日各自国内的部分极端主张“相互助势”，将民意推到两国不得不动手的地步。不应让钓鱼岛争端破坏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大局。

其三是坚决维护领土主权与使用非军事手段维护主权利益“双管齐下”，这在中菲围绕黄岩岛对峙时已有过成功经验（菲律宾贸然出动军舰导致被动）。目前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已有多家非军事机构在进行工作，今后宜进一步在国家统一的外交方针下加强相互沟通和协调。

其四是吵架与合作“双管齐下”。1972 年 9 月 27 日，正当中日复交谈判的关键时刻，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等日本客人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住处。刚一进门，毛泽东就说道“你们吵架吵完了？”这句幽默、机智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复交以来的 40 年对于中日来说是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 40 年，同时，也可以说既是合作的 40

^① 叶小文《中日都要防范极端分子挑事》，《环球时报》2012 年 7 月 27 日。

年也是“吵架”的 40 年，有时候“吵架”吵得太厉害，甚至影响到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比如，在上述的“靖国逆流”时期，围绕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两国吵得非常厉害。当时，曾有人认为，解决历史问题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历史问题不解决，中日关系就无法发展，似乎历史问题成了中日关系的全部。后来，被实践证明为有效的方针是：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努力发展中日两国关系和民间交流；解决历史问题需要以发展中日关系、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作为依托。这个方针也被称为“双管齐下”模式。

如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有所升温，两国间的气氛似乎又回到了某个问题不解决，两国关系就无法发展的怪圈。

其实，钓鱼岛问题早在 1972 年中日复交之前就已经存在，至 2010 年 9 月 7 日撞船事件发生，钓鱼岛问题的存在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两者并存的局面已经持续了 38 年。钓鱼岛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在钓鱼岛问题之外，中日两国还有很多需扎扎实实去做的互利双赢的事情和功课。因此，即便在撞船事件以后至今，中国采取的方针仍然是“双管齐下”：不为严峻挑战所动，不为复杂局面所惑，依然坚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在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上既坚决又不焦躁，将解决钓鱼岛问题和发展中日关系这两方面的努力“双管齐下”地继续向前推进。正如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 2011 年所说“中方认为，有一百条理由使得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①

然而，正值中日复交 40 周年的 2012 年，日本右翼和政府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不顾中日复交以来两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互相刺激、不做过激举动的默契^②，无视国内有识之士发出的理性主张，围绕钓鱼岛问题步步紧逼地采取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激化两国矛盾的冒险主义政策。如果日方继续一意孤行，将“吵架”推向“打架”，将可能给中方坚持“双管齐下”模式造成极大困难甚至打上句号，由此，中日关系将可能被推向复交以来甚至是战后以来最危险的境地。

（责任编辑：李璇夏）

① 《人民日报》2011 年 3 月 8 日。

② 张慧玉《日本首相公开加入“购岛”闹剧》，《世界知识》2012 年 8 月 1 日。

太郎と日本政府は「島の購買」を以って、その「主権領有」を明らかに示そうと企てているが、このような「島濯ぎ」という陰謀は必ず失敗する。釣魚島問題は国家の核心利益に関わっている重大な関心を寄せる問題であるから、中国は断固とした対応策をとることによって、既にわりとよい効果が収められた。今後、中国は、各種類の力を弛まずに強めて、主動権を取って、一日も早く釣魚島問題を解決して、中日関係の更なる飛躍的な発展をなしとげさせるよう努力すべきである。

国交正常化 40 周年：中日関係 のなかのアメリカ要素

馮 昭奎

中日国交正常化以来、二国関係のなかの「アメリカ要素」の本質は、米日不平等が中日関係に対する影響である。2010 年のアメリカの「アジア回帰」は、もともとアジアの国である日本の「アジア回帰」を阻害している。釣魚島問題は、1971 年にアメリカが沖縄返還の際、中日間に仕掛けた「地雷」である。国交正常化 40 年間の一つ重要な教訓は、中日両国が共同で平和的にその「地雷」を排除することであり、それと同時に、「雙管齊下」は中日の間に各種の矛盾と問題を解決する有効な方法である。

日本の対中国大戦略への一試論

— 「関与」と「ヘッジ」をキーワードに —

吳 懷中

中日国交正常化以来、日本の対中国大戦略はそのキー・コンセプトが関与とヘッジからなっており、以下のような変貌コースを辿ってきた。即ち、1970 ~ 1980 年代においては、関与政策によって中国を対ソ封じ込めの協力へ誘い、近代化支援による西側世界へのシフトを図った。冷戦終焉後は、戦略的関与と戦術的ヘッジによって中国を西側主導のスタンダードやシステムへの受容・参入に導き出そうとした。21 世紀に入ってから、中国の台頭に対し、関与の難航やヘッジの展開が日中関係に不安定をもたらしていた。そして節目としての 2010 年から関与とヘッジは既に台頭した中国を如何にルール遵守と責任のある大国へ変容させるかに収斂されているが、ヘッジのほうが政策としてむしろ目だっ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これによって、これからの中日関係はより大きな圧力と軋轢に臨んでいく可能性が出てくるだろう。